

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ZHUYI JINGJI LILUN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DE HUIGU YU ZHANWANG

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研究》编辑部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尚 木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研究》编辑部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5.5印张 397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统一书号：4454·004 定价：3.50元

前 言

1985年《经济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就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回顾，并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书是在这个讨论会的基础上组织编写的。参加本书撰写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四川财经学院、湘潭大学、浙江省委党校等单位的学者和专家（各章撰写人名单附后）。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转换的阶段，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探索，作出新的回答。因此，回顾建国以来经济理论演变的进程，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展望未来，提出研究的新课题，是很有必要并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十分丰富，本书篇幅所限，不能包括所有问题，只能就一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联系密切的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评述，同时兼顾近几年我国经济科学领域出现的个别新学科的进展。

于光远同志在上述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作为本书的代序。全书共二十三章。本着百家争鸣精神，各章评述系反映作者的观点，不强求统一，有的章节内容互相有些交叉，而论述角度有所不

同，因而保持了各章的体系。

本书编辑小组成员为陆南如、乔桐封、钟华、技术编辑欧宏。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经济日报出版社庄怡等同志的大力协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本书各章撰写人

代	序	于光远			
第	一	唐宗焜	第十三章	陆立军	
第	二	董辅弼	第十四章	李学曾	
第	三	荣敬本	第十五章	田江海	
第	四	唐宗焜	第十六章	朱铁臻	
第	五	刘诗白	第十七章	王积业	
第	六	王松霈	第十八章	张问敏	
第	七	张卓元	第十九章	杨长福	
第	八	张卓元	第二十章	张朝尊	
第	九	赵人伟	第二十一章	薛永应	
第	十	戴圆展		刘方械	
第	十一	王振之	第二十二章	李新家	
第	十二	刘光第	第二十三章	乌家培	
				刘树成	

目 录

经济科学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鼓励(代序)·····	(1)
第 一 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展和当前 面临的课题·····	(13)
第 二 章 中国的发展战略及其转变·····	(39)
第 三 章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	(73)
第 四 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	(91)
第 五 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111)
第 六 章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127)
第 七 章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52)
第 八 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	(179)
第 九 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	(203)
第 十 章 社会主义价格理论·····	(225)
第 十 一 章 中国价格体制改革·····	(240)
第 十 二 章 社会主义货币与货币流通·····	(253)
第 十 三 章 社会主义生产劳动·····	(268)
第 十 四 章 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	(291)
第 十 五 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312)
第 十 六 章 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理论·····	(329)
第 十 七 章 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	(349)
第 十 八 章 按劳分配·····	(375)
第 十 九 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394)
第 二 十 章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	(418)
第 二 十 一 章 生产力经济学研究·····	(430)
第 二 十 二 章 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研究·····	(449)
第 二 十 三 章 经济数量关系研究·····	(468)

经济科学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鼓励*

(代序)

于光远

这次会议有两项议程：给《经济研究》的优秀理论文章的作者授奖和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进行学术讨论。

授奖是为了鼓励，回顾是为了总结经验。鼓励和总结经验是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两者都是为了使我们在展望四化建设的前景时能有更充分的根据。我认为会议组织者的安排是很适当的。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经济科学研究是应该受到特别鼓励的一种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经济科学的指导。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人类历史上还只有不到七十年的历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的许多经济科学部门，正在建立和发展。经济科学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也不少。需要社会上特别是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对它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这种既重要又艰苦的工作给以很大的鼓励。因此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我想不妨先回顾一下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经济科学受鼓励的情况。

在经济科学工作方面和在许多方面一样，它的历史也应该分为两个阶段来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本文系于光远同志1975年5月2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科学和经济科学工作者也不是没有受到任何鼓励。因此我主张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也回顾一下这方面受鼓励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今后也不妨汇集一下有关资料。回顾历史事实要力求客观。不过在今天我回想了一下，经济科学和经济科学工作者受到的鼓励不多。建国以来我多年一直没有离开科学组织工作岗位。应该说我知道的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还是受批评较多，受鼓励较少。经济科学研究所受的鼓励与经济科学的重要性很不相称。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问的。我觉得对于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鼓励莫大于能使科学研究工作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他们的劳动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至于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生活条件，部分地是每个人所关心的生存、享受和发展与表现自己的需要，部分地事实上还是工作条件。

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者所需要的条件，一方面无非是接触实际资料的方便，研究工作时间的保证，助手，为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工作（如抄写、复印、打字）等，这些基本上属于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政治气氛和良好的学风等精神方面的条件。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都解决得不好，或者简直可以说都很不好。

关于第一方面的条件我不想多说了。比方说，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我们曾经多次提出要为经济科学工作者建立供研究用的资料馆。此事一直没有落实。巧媳妇难作无米之炊。我国经济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与实际不能很好结合的责任，不能全由经济科学工作者自己来承担。关于第二个方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顾的事就更多了。

今天我们纪念《经济研究》创刊三十周年。这个全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刊物创刊于1955年。当时正处于两大历史事件的前夕。一件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建设时

期。还有一件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解除。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56年。因此，这个刊物创刊之初百家争鸣的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利用那时的好形势，在1957年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1959年初又活跃了一下，秋季接着又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总之，当时运动不断，批判不断。孙冶方同志受批判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事。而到“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时的情况更不用说了。所以，为发展经济科学所需要的学术自由，所需要的百家争鸣局面，除了短暂的几段时间以外，始终没有形成。

最近我回忆起五十年代百家争鸣的两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一个是1956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这是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中宣部帮助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召开的会议。会开得很好。1948年苏联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名义召开了一次遗传学讨论会。这是一个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打棍子、戴帽子、强迫检讨的会议，是恶劣地对待科学工作和科学工作者的典型。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就是和这针锋相对，贯彻百家争鸣的会议。由于1948年苏联的那个会议有一个速记记录，在莫斯科出版并在我国很快地翻译了过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我们也作了详细记录，会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但未公开发行）。这是一次成功的百家争鸣的会议记录，最近这个会议记录和有关历史文献已经交出版社，几个月之后它将公开出版。

另一个是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经济理论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讨论了两个题目，一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一是计件工资。这次会议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上虽然不那么彻底，但总的来说，它是一次回忆起来使经济科学工作者高兴的会议。可惜那次会议的召开已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前夕，这样的讨论未能继续下去。如果1959年上海经济理论讨论会那样自由的学术讨论能够继续下去，最近才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明确的理论问题，也许可以早许多年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长期没有能够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当然同当时总的指导思想分不开。不过有时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如在六十年代（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有一次向毛主席请示：学术文章有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说，就是让马克思做中宣部部长，恩格斯、列宁做副部长，也管不了那么多，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前几年我想起了这一件事，专门找陆定一、周扬、林润青同志核实了一下，他们说毛主席确实是这么说的（当时中宣部作了传达）。这一件事没有文字记载。有一件事是有文字记载的。前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收进了一封信^①。信中讲到一件事，那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北大生物系教授李汝淇写了一篇赞扬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文章。文章本来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毛主席看后，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代《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按语，将文章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主席有些话讲得很好，很彻底，可是做的时候有时则是另一回事。这也说明对学术自由的思想并不那么牢固。“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科学工作中未能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状况是分不开的。

前面说到孙冶方同志受批判的事。那次批判是有毛主席指示的。当时中宣部、《红旗》杂志社都积极执行了。我因为没有提出要批判孙冶方同志，曾经因此受到过斥责。但是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下，当时我并没有反对对他的批判。我讲这一点为的是说明，在那时候，对学术问题上搞大批判的那种方法，包括我在内，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人具有认为应该反对的觉悟。在1983年春节，即孙冶方同志逝世前不久，我到医院去看他。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说话已经很吃力。那次见面，出于感激之心，他说了一句话：“光远，谢谢你。”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他知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支部会上作

① 《致胡乔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6页。

了一个学习孙冶方同志的发言，我的发言马列所党委印出了。后来我又在昆明作了一个学习孙冶方同志的报告。这些事他知道了。在孙冶方同志病房里看护他的同志说冶方同志知道我表扬了他，所以要谢谢我。于是我就伏在他的枕头边大声对他说（因为这时他的听觉已经很不好），在昆明我讲了四个问题：1. “重病中的你”，2. “你具有无产阶级学者的风格”，3. “我愿意为你的正确观点进行宣传”，4. “你和我”（孙冶方和于光远）。我在告诉他这四个小题目之后，对第四个问题又多讲了几句。我在他耳边总结了我俩的交往：“文化革命”前，我们两人有双重关系。第一，我们两人都是经济学家；第二，我们两人都是科学组织工作者。作为两个经济学家，我们两人的关系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没有做实际经济工作，一直在意识形态部门，我的工作侧重点在理论方面，因此我对冶方同志提出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重视不够。我虽然没有反对他，但未能给予足够的支持。“文革”后，我不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了，更多地注意了实际经济问题，现在我能想地方书记和省长所想，想中央经济部门部长所想了；对你的一些关于体制改革建议的评价，认识比以前大有进步。作为两个科学组织工作者，你是经济研究所所长，我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在你们上级机关工作，中宣部批评你，党中央批判你，我没有反对。我对冶方说，今天我也不打算检讨，因为当时我不可能把自己放在能够反对批判你的地位上。首先我没有这个觉悟，我自己认为你的讲话成问题。（对这一点当时我没有说出的话是：虽然你自己否认主张利润挂帅，但是人们认为你主张利润挂帅，我觉得别人那么认为还是有道理的。而批判利润挂帅我又认为是毫无疑义。当时我没有这样的认识：尽管我们有理由不赞成利润挂帅——我现在也不赞成，但是仍然不应提批判利润挂帅的口号。不赞成利润挂帅和“批判利润挂帅”这样的口号是两回事。提“批判利润挂帅”这样的口号的结果是人们不敢抓利润。不赞成某种东西和提批判某种东西的口号是两回事。这样的道理是

我总结批判利润挂帅的经验得出来的，而在批判孙冶方时我没有这样认识。）其次，当时我还处在毛主席讲的话不会错的认识状态。毛主席提出要批判你，我不会去想不应该批判你。我知道中宣部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根本没想到毛主席提出来的还应该反对。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不会不去反对这种批判了。我认为定一同志有了这个觉悟，周扬同志也有了这个觉悟，我自己也有了这个觉悟。

我讲话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当我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吃力地说：“我听明白了”，而且重复了两次。当时我也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虽然我这个人不那么喜欢整人，也不那么会整人，我批判别人的才能是差一点，在中宣部内几次批评我不重视批判，热心自由讨论，热心建设，但是对这种批评基本上我是接受的，长期以来我还认为这是自己的缺点。

那次谈话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我同冶方交往了几十年，总算在冶方逝世前把我们两人的交往作了一个总结，我内心因此而得到一种安慰。

如方才我讲过的那样，我讲这段往事的目的不是想夸大自己的觉悟，说什么我从来希望和坚持主张要实行学术自由。事实上我没有反对批判孙冶方这样的事，就说明我没有那样的觉悟。现在盖棺论定，这种批判是错了。今天我的思想明确到这个程度：正如创作自由是文艺发展的一条规律一样，学术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性，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所谓客观规律性就是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说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并不是指在任何情况下学术研究都必然是自由的，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但是，学术不自由，科学发展就迟缓，得不到繁荣，这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必然性。这种情况同按劳分配规律相似，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按劳分配规律，这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按劳分配的原则都必然得到贯彻。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因为这个原则有时就得不到贯彻。但是，按劳分配得到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得就快；按劳分配得不到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很好发展，却是必然的。规律是本质的关系。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这种本质联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不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甚至批判按劳分配原则，如“四人帮”统治时期那样。但结果上面那样的必然性也变不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让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就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中应该得到物质上的鼓励。人们在从事学术研究这种劳动中也应该受到鼓励。这方面的鼓励也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也要比较好地满足研究工作的条件，而实行学术自由，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精神上的一种鼓励。对于精神生产，不论是文学创作或是科学研究，需要有学术自由这样一种鼓励，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所以我写过这样几句话：“欲致鱼者必先通水，欲致鸟者必先树木，欲在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先造成自由的学术讨论空气。”前两句古文是我从《淮南子》上引来的。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客观规律。

三十年的回顾就是个总结经验。三十年的经验要总结的很多，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讲有关鼓励这一个问题了。上面我说了经济科学工作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一段时间内所处的地位未能与经济科学本身应得到的地位相称，我认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特别是从负责同志阅读我国学术界的经济科学著作的状况，经济科学工作研究出来的优秀成果被他们肯定的状况，被应用的状况来衡量，经济科学是处在那样的地位。譬如说，某个经过研究提出来的观点，提出来的建议，如果是正确的，本来该考虑采用。但是这种情况在那一段时间内似乎不那么多。基本的状况是不予重视。好象经济科学工作者是在一边，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另一边。经济科学工作者研究他们的经济科学，实际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凭他们的经验做他们的经济管理工作。实际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极少参加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讨论，甚至为了表示支持到一下会的，在那段时间也很少，因此也就很少去了解：

我国经济科学工作者都在研究什么、讨论什么；他们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的意义何在；他们都取得了一些怎样的成果等等。而许多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自己本来是有很好的条件（因为他们了解许多实际情况）可以很好地同经济科学工作者一起从事发展经济科学这样一种实践的。这两部分人处于平行作业的状况。当然我并不是说两方面的人彼此不发生影响。事情不会是那么绝对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回顾这样一种基本的状况，描绘得对不对还要请同志们批驳。如果我对当时的状况描绘得正确的话，许多年来我国经济科学的地位就是没有和它本来应该有的地位相称。

总之，从经济科学受鼓励的角度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段时间内（从1955年起计算有二十四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不是没有责任的。比如对上面说的那种平行作业的状况不少经济科学工作者安之若素，满足于这种不相往来的状况。两种人的结合总该双方努力才行。所以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对这种平行作业也负有责任。我们应该积极地提出，这种状况不好。孙冶方同志在这方面是突出的。他使劲地敲实际工作的大门，不满足于仅仅搞理论研究。也因为这一点，他不招一些人喜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很多理论性文章只是去做解释性工作，把自己理论研究降到仅仅为现行政策做解释的地位。经济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地位在于他的创造性，在于他进行独立思考，有独立的见解。尽管某个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某种见解不一定对，但是它往往是人们取得最后站得住脚的成果的一种必然的中间产物。如果不允许不正确的见解的形成与发表，也就不会有最后站得住脚的优秀成果。不少经济科学工作者没有充分地认识经济科学应有的地位，没有充分认识自己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也是一个问题。也因为这样，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从1955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经济科学工作的成绩。尽管搜集起来我们写的文章在数量上不少，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和可能取得的和应该取得的成果相比，还是相距很远很远的。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目的不是讨论有无成果（当然是有成绩的），而是讨论对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否得到充分的评价，从中取得经验和教训。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如同许多工作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划分阶段一样，经济科学工作也是这样。经济科学比前一段受重视得多了。这一段时间内的情况，在座的包括年轻一些的同志都知道，用不着我去回忆和列举了。在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在1979—1980年为了研究经济问题就成立了几个经济科学小组，包括体制问题、结构问题、理论和方法问题等等。这几年各种经济科学的会开得不少，各种经济科学团体成立的也不少，经济科学的刊物也出版了许多。这些情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所无法比拟的。尤其使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受到鼓舞的是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赵紫阳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长一段讲到孙冶方同志的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惜的是这是在孙冶方同志逝世的前夕，如果早一点肯定孙冶方的那些正确的建议，更早的对他做出正确的评价，就更好了。但是即使是晚一点，这样做在经济科学工作者之间反响强烈。在党的“十二大”开会期间，我和孙冶方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最后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尽管在这篇文章中他所强调的折旧归谁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目前企业折旧留成比重有增加的趋势，也正在考虑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折旧甚至全部留归企业的问题。只要经济科学工作者的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受到重视，被采纳，这就是最大的鼓励。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被采纳的事情系统化，做得更好一些。当然，受鼓励的并不一定是很优秀的成果（优秀文章当然更要鼓励）。“千金买骨”嘛，既然愿付重金买良马骨头，说明非常重视好马，于是有好马的人就将马送来了。把对经济科学的鼓励的事情做好了，我相信在我国经济科学工作者中一定会出现更

多更优秀的成果。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生活中经济是建设工作的重点，需要研究的经济科学问题许许多多，需要建立和发展的经济科学部门也有许许多多。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使我国的经济研究得到有力的、全面的发展。许多问题可以得到研究，许多学科可以得到建立和发展。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可以希望得到大的发展。需要和可以得到发展的，首先当然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必须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科学的皇冠，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理论经济科学中，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还应重视生产力经济学。它是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一门经济科学。现在许多学校，特别是理工农科学校，对这一学科非常感兴趣。交大的一个系，政治经济学安排了57个学时，生产力经济学也是57个学时。在理论经济学中可能还包括对消费经济的理论研究。在理论经济学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实用的经济科学部门。同时，除了研究整个社会经济的经济科学外，还有许许多多研究单个部门的经济科学，其中往往既有理论经济科学的内容，也有实用经济科学的内容。

总之，经济学科多得很，需要我们去建立和发展。现在存在一个问题，不少新学科得不到承认，不能招研究生，不能授予学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长期就只有老学科了。这个问题要解决。当然不是所有提出的新学科最后都能够成立。但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新学科的发展和经过讨论来解决，不能由少数人来决定。如果对新学科有怀疑，不妨举行讨论会，但是如果一看到新学科就怀疑，就不肯承认，我认为是很不对的。我认为不肯承认具有生命力的新学科的观点是一种陈腐观念。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应成为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恩格斯说，实际的需要比许多所大学对科学的推动力量还要大。中国经济发展这样的实际需要，也一定能比许多所大学